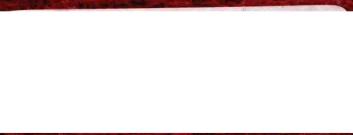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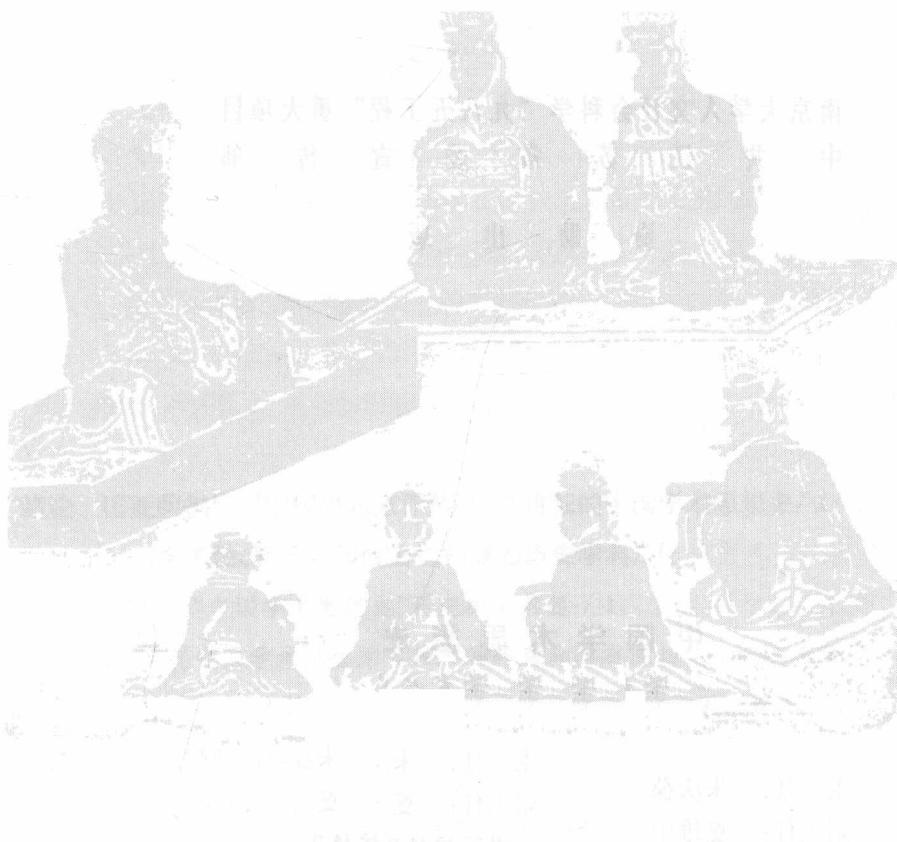
中国学术思想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

蒋广学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思想史

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

蒋广学著 李昱校订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 / 蒋广学著；李昱校订。—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
(中国学术思想史 / 蒋广学主编)

ISBN 978-7-305-14466-0

I. ①中… II. ①蒋… ②李…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49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中国学术思想史
蒋广学 主编
中国学术思想史纲要
蒋广学 著 李 昱 校订

责任编辑 李 娟 马蓝婕 编辑热线 025-83594071
责任校对 金学波
装帧设计 赵 秦
封底篆刻 阎明罡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1/16 印张 28.25 字数 443 千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4466-0
定 价 10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账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绪论 匡亚明倡导、《中国思想家评传》作者耕耘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 1	1
一 一门学术性、思想性和政治性相兼的历史学科 / 1	1
(一) 首倡“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梁启超 / 1	1
(二) 深究中国学术思想原本精神的钱穆和具有深切使命感的李泽厚 / 3	3
(三) 将社会史、学术史和思想史融为一体的新外庐学派 / 6	6
二 匡亚明团队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 9	9
(一) 匡亚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卓越见解与推动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贡献 / 9	9
(二) 从组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到探索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建设 / 15	15
三 以入学为中心,与多学科综合、交叉发展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 16	16
(一) 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探讨 / 16	16
(二) 多学科综合与交叉发展的研究方法 / 19	19
(三) 养成仁爱、博通、理性和具有时代使命感的新人格 / 22	22
第一章 上古战争观念的发展与古典兵学的诞生 / 24	24
一 “征战”与华夏民族的初步形成 / 25	25
二 商殷人的“代天罚恶”与周初的“王天下”思想 / 31	31
(一) 商殷人“代天伐恶”的战争观念 / 31	31
(二) 周初“王天下”的战争观念与王道政治 / 34	34
三 春秋霸政与中国古典军事学的诞生 / 39	39
(一) “止戈为武”实为霸主追求的共同目标 / 39	39

(二) 春秋霸政与我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经典著作的诞生 / 44

第二章 “天人相与之道”与易学的孕育、产生和发展 / 51**一 从“民神杂糅”到“绝地天通” / 51**

(一) “绝地天通”是从洪荒时代进化到文明时代的标志 / 51

(二) “绝地天通”给统治人间的权力赋予神权的性质 / 54

二 上古通天术：有科学成分的历学和神秘主义的星占学 / 56

(一) 司历之祝的产生及其职能 / 56

(二) 星占学的主要功能是对统治者进行道德劝诫 / 61

三 易学的孕育与《易经》之产生 / 65

(一) 与占星术并行不悖的龟卜与筮占术 / 65

(二) 八卦既是筮占术，又含有寻求天道的理性追求 / 67

四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的上古易学 / 70

(一) 春秋时期思想家对“幽赞而达乎数”筮占术的怀疑 / 70

(二) 由以卦测命向“明数而达乎德”方面发展的儒家易学 / 74

第三章 “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的三代历史学 / 77**一 “社稷永续”与上古的史官设置 / 78**

(一) 统治者的鉴古意识与上古史官的设置 / 78

(二) 上古的史官设置 / 83

二 周初成康之际，周公旦对于历史教训的大总结 / 85

(一) 起伏跌宕的夏商两代史 / 85

(二) 周公旦对夏商史的初步总结 / 88

三 以记载“人言”、“国事”为中心的春秋史学 / 92

(一) 君臣善恶毕书的春秋史官 / 94

(二) 春秋史学对国家天下兴亡规律的初步认识 / 96

(三) 实录社会文明曲折发展的脚步 / 98

第四章 孔子对春秋学术的总结与“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孔子学说 / 102**一 分封制矛盾的恶性发作与以“义”对“利”观念的确立 / 102**

(一) 王权的独专性与宗族成员间的弑杀导致“礼崩乐坏” / 103	
(二) 以义克利之教与对封建宗法等级制的施救 / 106	
二 鲁三桓新政既是孔学派的孕育者,也是孔学派的批判对象 / 110	
(一) 鲁三桓改革运动的二重性 / 110	
(二) 孔子与鲁三桓的二重关系 / 114	
三 以“义”为基础,“礼”为主体,“天下归仁”为目标的孔学派 / 119	
(一) 孔子首先是上古文化的全面总结者和继承者 / 119	
(二) 义、礼、仁三位一体作为孔子思想的主体,是崭新的理论创制 / 122	
四 余论:不是孔子“从周”而是西周“从”孔子 / 128	
第五章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墨、道、法对儒学的批判 / 130	
一 春秋思潮的余波:墨、道两家对儒学的夹击 / 131	
(一) 墨子学派对孔学派的反叛与批评 / 131	
(二) “道法自然”的老子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批判 / 137	
(三)《庄子》的“道通为一”:对老子道论的深化 / 141	
二 孟荀儒学对于社会发展潮流的新回应 / 145	
(一)“兼爱非攻而辩性善”的孟子学说 / 145	
(二)“主性恶而隆礼治”的荀子学说 / 150	
三 法家学说的胜利与秦始皇“焚书坑儒” / 154	
(一) 先秦法家学说的产生与发展 / 154	
(二) 秦始皇是法家学说的实践者 / 159	
第六章 “天人合一”大一统理论形态的确立与汉代各科学术的发展 / 162	
一 从崇尚黄老,到儒学之复苏 / 163	
(一) 汉初君臣共奉因势而省、朴、柔、顺的统治术 / 163	
(二) 从黄老向积极有为的儒法兼用的统治思想的过渡 / 164	
二 董仲舒天人合一“大一统”思想观念的理论阐发 / 171	
(一)“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汉武时代 / 171	
(二) 董仲舒“天人”学说的主要内容与特色 / 174	
三 自然神学对汉代各科学术的影响 / 181	

(一) 就学科而论,谶纬神学和象数易学特别发达 / 182	第二章
(二) 神学化的历书——三统历 / 183	第二章
(三) 深受天人合一观念影响的历史学——《史记》和《汉书》 / 185	第二章
(四) 政治神学的结晶——《白虎通义》 / 186	第二章
(五) 余论:在神学目的论压迫下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缓慢发展 / 188	第二章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对统治学说的新探与唐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 / 191	
一 魏晋南北朝“无主旋律”的思想演进曲 / 192	第三章
(一) 汉代政治现实与汉代儒家理想的尖锐矛盾 / 192	第三章
(二) 始与“神学”对立、终至融会“名教”的玄学思潮 / 195	第三章
二 重新认识社会发展动力和伦理价值的历史学 / 201	第三章
(一) 范晔反谶纬而重人事、斥浮华而奖道德的历史观念 / 202	第三章
(二) 陈寿、裴松之重人事,尤重历史伟人德才作用的历史观念 / 204	第三章
三 北朝统治者的汉化政策及其实学之兴 / 206	第三章
(一) 自觉承继华统的北朝建国方略 / 206	第三章
(二) 北朝学者实证精神与为民兴利思想的发展 / 208	第三章
四 盛唐时期人文精神的巨大发展 / 210	第三章
(一) 以道家的思想改造儒家神秘主义的天道观 / 211	第三章
(二) 从理论上论证以民为“元元”的思想 / 212	第三章
(三) 唐代的礼法制度体现了“贵顺物情”的精神 / 213	第三章
五 盛唐文学由张扬个性向社会批判主义的转折 / 215	第三章
(一)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仙李白 / 215	第三章
(二)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圣杜甫 / 217	第三章
(三)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新乐府诗人白居易 / 218	第三章
(四) 主张“吏为民役”的古文运动旗手之一柳宗元 / 220	第三章
第八章 三教融合与“继天立极,扶正人心”的宋代理学 / 222	
一 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学术前提 / 223	第四章
(一) 理学产生的政治条件 / 223	第四章
(二) 理学产生的学术前提 / 227	第四章

二 “继天立极，扶正人心”的新儒学 / 238	第二章 新儒学的形成与“继天立极，扶正人心”
(一) “无极而太极”与“理一分殊”的道体论 / 238	
(二) 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与由化育流行而生成的气质之性 / 240	十讲
(三) 居敬、穷理、尽性的“工夫”论 / 243	中讲
三 与理学相互映照的诗学、与理学相互影响的史学 / 246	十一讲
(一) 重道德且情理相得益彰的诗学 / 246	十二讲
(二) 重伦理且理势相通的史学 / 247	十三讲

第九章 十一至十七世纪“格致学”的发展与明清之际的历史哲学 / 251

一 十一至十七世纪我国“格致学”的发展 / 252	第四章 西方“格致学”的不断积累
(一) 十一至十七世纪“格致学”发展的社会以及思想文化因素 / 252	五
(二) 金元明清初的“格致学”与近代科学思想的滋生 / 257	六
二 明清之际历史哲学的发展 / 267	七
(一) 李贽“人之外无道”的历史观念 / 268	八
(二) 顾炎武“道无器无所寓”的历史观念 / 272	九
(三) 王夫之“依人建极”的历史哲学 / 276	十
(四) 黄宗羲“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与天下回归于民的历史观念 / 280	十一

第十章 十二至十八世纪心学、文学与十八世纪适性论和情感哲学 / 283

一 从陆九渊，经王阳明，到泰州学派的发展 / 284	第十一章 古代哲学家
(一) 陆九渊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心学思想 / 284	二
(二) 王阳明“心即天，言心则天地方物皆举之”的心学理论 / 285	三
(三) 泰州学派首领王艮的“格物”之说 / 288	四
二 元明与前清之际的文学成就及其思想 / 289	五
(一) 元杂剧的发展和关汉卿的《窦娥冤》 / 289	六
(二) 以鼓吹个性解放为中心的明代人文主义思潮 / 292	七
三 十八世纪“适性论”和“情感哲学” / 299	八
(一) 《桃花扇》《红楼梦》代表着人文主义思潮的持续高涨 / 299	九
(二) 郑板桥的“适性论” / 303	十
(三) 戴震的“情感哲学” / 306	十一

(四) 乾嘉著名汉学家的情感论主张 / 312

第十一章 西学东渐与清代“官学派”对纲常名教学说的挽救 / 316

一 明清之际西学的传入与“西学中源”说的盛行 / 317

(一) 西方传教士所传“西学”及其对中土思想界的影响 / 317

(二) 前清“西学中源”说实是“以复古为解放”的别样形式 / 321

二 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宋学之转型 / 323

(一) 官宋学的衰落与以“研究方法之革命”护卫“主义之改良”的清汉学 / 323

(二) 桐城派宋学家对汉学的反击与经世派的兴起 / 329

三 船坚炮利下的“自西徂东”与“中体西用”文化观的盛行 / 333

(一) “师夷长技以制夷”与“卫我数千年之纲常” / 334

(二) 矛头指向革命运动的桐城理学派 / 337

(三)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与洋务运动对近代自然科学传播的推动 / 340

(四) “中体西用”乃是挽救纲常名教的“中道”思想形式 / 344

第十二章 清末立宪维新派的形成及其“中西会通”的民主思想特色 / 349

一 洋务运动的衰落与宪政维新派的兴起 / 349

(一) 列强瓜分中国侵略活动的加强与洋务派的分化 / 349

(二) 从“中体西用”到“政体艺用”的君主立宪派 / 352

二 立宪派对古代民本论的“误读”和改良主义的思想特色 / 354

(一) 康有为对民主思想的理解与对孔孟之“误读” / 355

(二) 梁启超、谭嗣同对民主思想的理解与对古代民本思想之“误读” / 357

(三) 严复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与对老庄之“误读” / 361

(四) “误读”与“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学术样式的形成 / 363

三 顽固派和革命派对政体改良派“新民本论”的双重攻击 / 364

(一) 对维新时期梁启超“新民本论”的补充说明与顽固派对康梁的批判 / 364

(二)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改良主义新纲领与物质救国论 / 367

(三) 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与“新民说” / 369

(四) 《民报》派对康梁的批评与梁启超对《民报》派的反批评 / 371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失败与改良派“新民本论”的衰落 / 374

第十三章 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渊源与思想特色 / 378

一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派的形成与其思想渊源 / 380

(一) 民主主义革命派产生的“外部”因素 / 380

(二)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派的思想渊源 / 383

二 中国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 389

(一) 从驱除鞑虏的“种族革命”到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民族主义 / 389

(二) 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真诚支持的民主主义 / 392

(三) 平分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 / 393

三 章太炎的民主主义思想与国学研究中的自由意志主义 / 397

(一) 种族革命的积极鼓吹者与其思想的平民性质 / 397

(二) 早期章太炎对于道家谋略思想的推崇 / 401

(三) 以“涅槃境”论自由、以“菩萨境”论平等的太炎哲学 / 402

四 余论：中国精英阶层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 407

参考文献 / 412

主要人名索引 / 422

重要词语索引 / 427

后记 / 435

绪 论

匡亚明倡导、

《中国思想家评传》作者耕耘的中国学术思想史

一 一门学术性、思想性和政治性相兼的历史学科

（一）首倡“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梁启超

眼下，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通史性、专题性或个案性的著作愈来愈多了。追本溯源，我国有“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名，肇始于梁启超(1873~1929)1902年至1904年发表在《新民丛报》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估计在他撰著是书时或有一念：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灾难岁月，为何花大心思做起“学术”呢？为此，他特做了一篇《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之文，劈头就曰：“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并不是龙腾虎跃而一度称雄世界的政治、军事人物，而是学术：“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①他列举了影响近代史的十位杰出人物：天文学家哥白尼、格致学家培根、数学家笛卡尔、法学家孟德斯鸠、民约论者卢梭、电学家富兰克林、工学家瓦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博物学家达尔文等。正是这些分布在不同学科领域杰出人物的学术思想，酿成了一股声势浩荡的启蒙思潮，迅猛地冲破中世纪神学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僵死的、严重脱离世俗生活的意识形态的藩篱而掀起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盛大运动，使西方主要的国家迈进了现代化的进程。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页110。

从梁启超的论述看，他所指论的“学术”，并非《庄子·天下》篇所指称的作为治天下之方的“道术”概念，而是涵盖在当今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广泛领域内，即他后来所说的：“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术(academic)就是人们为寻求真理、用之实际而在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意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系统知识。^①这是其一。其二，相对说来，这些系统知识可分两类：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和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知识。而梁启超所重者，是其学术中具有广泛意义，因而影响了一代学风、酿就一个时代“历史精神”的学术思想。如他对近代学术“二祖”培根与笛卡尔的评价：“中世以前之学者，惟尚空论，呶呶然争宗派，争名目，口崇希腊古贤，实则重诬之，其心思为种种旧习所缚，而曾不克自拔。及培根出，专倡格物之说，谓言理必当验事物而有征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儿出，又倡穷理之说，谓论学必当反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从之。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孑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学家恒言，二贤者，近世史之母也。培根、笛卡儿之关系于世界何如也？”^②所以，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欲覩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③

其实，在梁启超撰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前，日本学者已经有《支那哲学史》和《支那学术史纲》两种著作出版。梁启超写是书，主要是参考了后者，而“非欲为中国哲学史也”。^④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学术发展的长河中，很难找到与西方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相对应的“形而上”的学说，对此，梁在后来的《儒家哲学》中作过清楚的说明。而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在学术研究的初始阶段，学术史、学术思想史、思想史和哲学史，却又很难划定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25(下)，页12。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6，页112。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7，页1。

④ 梁启超著、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导读页13。

严格的界限，因而，长期以来，思想史、学术思想史大都与哲学史相混同。^① 这里，我们特别提出两位学者和一个学派对于学术思想史或思想史研究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二）深究中国学术思想原本精神的钱穆和具有深切使命感的李泽厚

钱穆(1895~1990)从1931年在北京大学开讲至1937年写成了一部重要的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虽不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但明眼人不难发现，这是与梁启超著于1924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学术观点上暗中交锋。梁讲此题，实是对《清代学术概论》的补充，而《清代学术概论》又是承续18年前《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余波。^② 原来，从1902年至1904年梁在撰写《大势》时，是想通过对古代学术的探源及发展轨迹的分析，得出中国近代学术界亦发生过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尔后必将思想大解放的结论。所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说：

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③

梁启超的最后一句话不可忽视，即虽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欧游心

^① 方克立《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京)，1996年第5期；张荣明《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探索与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西安)，2009年第3期。

^② 依朱维铮说应为16年前。详见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页24。

^③ 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文页1~2。

影录》跟着一部分西人大喊西方的“科学万能”破产了，但早期形成的思想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并未否定西方科学与自由思想的基本价值。在《大势》中，他曾经奢望：“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逐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因而，说到底，梁氏之国学，已经是西学化了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学术思想。梁启超在中西学大交汇的前期，数年间执中国学界之牛耳，不仅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西方学术思想，同时也是因为他把西方学术的现代精神贯注到中国学术之中，实现了中国学术向现代的转化。说到底，他是要让中国人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之中。

当中国社会的发展被迫纳入世界体系后，它的变化速度就大大加快了。谁能想到在中华民国的根基尚未确立之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将其魔爪伸向了华北。保存中华学术的真精神，铸就中国人的民族品格，便成学术界的迫切任务。钱穆正是带着这种情怀，讲述和撰著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的开山人物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都是很有民族气节的人，虽清入中原，因有此精神传播，中华之文运依然。但是，他继续说道：

今日者，清社虽屋，厉阶未去，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至于风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习之日污日下，则以为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怀。言学则仍守故纸丛碎为博实。苟有唱风教、崇师化、辨心术、核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伦政事，持论稍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②

其后之中国局势更加动荡，八年抗战、四年国内战争，国家分裂，钱穆与大批人士流寓他乡，内心之悲痛不可能不隐蔽于他的著作之中，严中西学之界，挖掘中国学术的人文价值而使之不隳，便成为他撰著中国学术思想史的根本宗旨。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7，页4。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3~4。

在《中国思想史》一书的“自序”中，他指出：若以西方标准来分析中国学术，不仅宗教和科学不发达，“纵谓中国并未有纯正哲学亦非苛论”。他解释说：“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离开人生界而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在于人生界本身。”因而，其宗教可谓之人文教，其科学“则仍主依随于人文中心之基点而出发，仍回复到人文中心所祈向为归宿”，宗教与科学只是人生之两翼，“常抱天人交通、天人合一之观念”。^① 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就是天命与人生合为一体的观念、以天道化育人性的观念。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总之，人是天的副本，是天德的承载者。凡不能承载天德者，必须对其认真进行教育。所以，学术的根本就是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这一思想，《中国学术通义》的自序中说得更为清楚。除论述这一根本命题外，他还针对近代学术分文史哲经诸情况进而说：

中国传统，重视其人之所以为之学，更重视为此学之人。中国传统，每认为学属于人，而非人属于学。故人之为学，必能以人为主而学为从。当以人作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乃亦尚通不尚专。既贵其学之能专，尤更贵其人之能通。故学问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为学术分门类，使人人获有其部分之智识。苟其仅见学，不见人，人隐于学，而不能以学显人，斯即非中国传统之所贵。^②

人文学科如此，自然科学亦是重内过于重外，重道尤过于重艺。如果我们打破今日之学科分类而总现经史子集，就可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文精神为核心，重历史精神，重融和合一，重教育，特别是作为中国学术之体的经学，“一向是看为是一种做人之学，一种成圣之学”，所以，在国家分裂、学术分途、人心分散之时，钱穆做中国学术思想史，就是要在各科学术中，把如何做人、如何成圣的精神高扬出来。^③ 改革开放之前，钱穆的书极少传到大陆，而近三十年来，他的书在大陆得以出版，使国人看到了这位面对国难的著名学者以中

^① 钱穆《中国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版，页3、5。

^②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7年版，序页4。

^③ 见《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四宾师》，载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明道而救世的心志。

在大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中，李泽厚（1930～）算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他个人撰著了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思想史论”，虽非以史为重，但从史论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对中国思想发展的卓识。在古史论中，他的思想史论虽然注重对哲学思想的关注，但由于他具有美学家的气质，以及长于心理学的分析，所以提出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思想的主要思潮、派别和人物；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辨的；秦汉时期所形成的、具有有机反馈机制的“天人感应”宇宙观影响至今；庄子、禅宗的哲学是对人生作形上追求的美学；宋明理学作为道德形上学具有重要价值以及明清时期政教合一传统已开始动摇，等等。如果说这些观念表明他的视野仍然在传统的哲学史领域的话，他对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则将重心移到政治思想领域。他认为：近现代的人物或思潮，或明或暗地提出了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曲，而东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危险，致使救亡压倒了启蒙。同时，革命思想在现实运动中总是压倒改良思想，但从其对历史过程的影响看，改良应该优于革命。^① 李的观点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来说，并无意义，因为客观的形势逼迫着社会精英选择了革命；但是，对于中国的未来，倒有极大的价值。

（三）将社会史、学术史和思想史融为一体的侯外庐学派

一个学派，是指以侯外庐为首的，以马克思主义原典思想为指导、以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重点揭示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的“思想学说史”学派。侯外庐（1903～1987），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极少见的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原典，以十年之功翻译《资本论》一、二卷，且又研读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通过对马克思原本精神和逻辑思维方法的把握，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在“国家”产生时，氏族制的血缘关系，并未像古希腊、古罗马一样，被国家制度所断裂，而是继续延伸到新的社会机体中，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结构，这一“死的抓住活的”国体结构，不仅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新的生产关系

^①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修订本），第三卷内容简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产生的艰难性，致使到十六、十七世纪才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反映到思想领域而产生早期启蒙思潮亦历经苦难，坚持以“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展开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势必也要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与挖掘、阐发“人之所以为人”者的哲学史、思想史学派相对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西北大学思想史所为基地的侯外庐学派更重视社会发展阶段时代思潮的研究。其前期的成果体现在六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中。^①而以萧萐父为首的中南地区学者作为侯外庐学派的重要友军，对早期启蒙说的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②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在张岂之的率领下侯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对思想史作出了更为精准的定义。张岂之多次说：

思想史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中国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法律思想、科学思想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思想史，既可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是综合研究。而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③

同时，他根据思想史研究不断深入的新态势，提出了应该把重视研究社会思潮的思想史研究与各门学科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更加深入地展示中国人思想发展的脉络和面貌。所以由他主持，聘请各地的学者，费时多年完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和六卷九册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对于2007年出版的后一套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概括它的基本观点时说：中国思想史的主要

^① 张岂之《侯外庐先生思想史研究的卓越贡献》，《哲学研究》（北京），1987年第11期。李学勤《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萧萐父、许苏民《“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论集》（第二辑）。我们要作补充说明的是，以萧萐父、李锦全为首的中南学派在改革开放后，重点在明清之际的思想史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冯天瑜、谢贵安《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张岂之《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张世林《学林春秋》二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